

# 作为隐喻的建筑

[日]柄谷行人著 应杰译

主编 赵京华

柄谷行人文集 I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作为隐喻的建筑

〔日〕柄谷行人著 应杰译

主编／赵京华

柄谷行人文集 I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隐喻的建筑 / (日)柄谷行人著; 应杰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11

(柄谷行人文集; 1)

ISBN 978-7-5117-0614-0

I. ①作… II. ①柄… ②应… III. ①解构主义—研究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2378 号

INYU TO SHITE NO KENCHIKU

by Kojin Karatani

© 1983, 2004 by Kojin Karatan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ese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2004.

Thi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1

by the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Bei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opriet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作为隐喻的建筑

---

出版人: 和 龔

策划编辑: 冯 章

责任编辑: 冯 章 姜 迪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 (总编室) (010)66509366 (编辑室)  
(010)66509364 (发行部) (010)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010)66161011 (团购部) (010)66130345 (网络销售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100 千字

印 张: 12.75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66509618

## 作者简介

---

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 1941年生于日本兵库县尼崎市。早年就读于东京大学经济学本科和英文科硕士课程。毕业后曾任教于日本国学院大学、法政大学和近畿大学, 并长期担任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和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客座教授。2006年荣休。是享誉国际的日本当代著名理论批评家, 至今已出版著述30余种。代表作有《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走向世界共和国》等, 2004年岩波书店出版有《定本柄谷行人集》全5卷。

夹在第二本里的那封信写给替丁尼生出书的出版社，短短一句话，吩咐出版社让厄特里教士随便挑走诗人的书，要多少给多少。签名底下日期是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二日。第三本里珍存的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写给诗人作家贝涅特，也很短，谢谢贝涅特的乐谱和诗评，说不是每一只鸟都会唱出这样好听的歌。这三封手札里写给厄特里那封连信封都保存了，贴着一个便士邮票，教士地址在 Streatham Common，我旅居英伦那几年住过那一区附近，搭火车天天经过，是个老乡镇，绿荫怡人，整天懒洋洋，连火车站月台上的鸟胆子好像都比别处的鸟大，不避人。奇怪，一八二七年那本丁尼生昆仲诗集书后贴了一张对折手稿，写明是丁尼生没有发表过的诗，共五节。字迹纤秀，英国朋友说不像丁尼生笔迹，我看也不像。这三本书里夹着的三封手札《丁尼生书信集》里都收录，那五节未发表的诗倒是待考了，要慢慢翻查丁尼生传记材料也许拼得出头绪。

我今年六十八，猎书猎字猎句猎了大半辈子，偶然猎得这样一盒老书几页旧信依然高兴得不得了。小时候

## 中文版序言

本书的第一个版本，完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当时，我既与建筑毫无关联，也没有什么建筑师朋友。因此，在我写作《作为隐喻的建筑》时，这也仅仅只是“作为隐喻的建筑”，我是将此作为哲学或文学批评来写的，做梦都没想到建筑师会阅读它。

但令我惊讶的是，建筑师矶崎新高度评价了我的论文，并把它推荐给了美国建筑师彼得·埃森曼。后来，他们邀请我担任 1991 年至上世纪末 10 年间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名为 ANY 的建筑师国际会议的常任会员。我的书还作为建筑理论系列的第一本由 MIT 出版社出版发行。我因此突然间结交了国内外众多建筑师。我多少了解了些现实建筑方面的知识，就是在这以后。

但再说一遍，在写《作为隐喻的建筑》时，我并未对建筑作任何具体的思考。我只是对城市规划有些兴趣而已。实际上，我在本书中列举的建筑师或建筑批评家仅有两人。

他们是《城市不是树状结构》的作者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以及《城市经济学》的作者简·雅各布斯。他们都对城市规划（planning）提出了激烈的批判。他们的著作超越了建筑或城市设计问题，引起了我哲学的、政治学的兴趣。

建筑自古有两个起源。一是住房，二是神殿、王宫类的庙堂。一方面是个人的，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的。这两极至今犹存。比如建筑师从住房起步，一旦成名，就开始建筑纪念性建筑。与此相比，城市设计又怎样呢？在一定意义上，它处于住房与庙堂两极的中间。

城市设计不同于住房建筑之处在于，它把建筑看作是多个住房或建筑相关联的整体，即建筑在此是“社会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也不同于纪念性建筑。后者象征着国家以及祭祀的权力，而城市规划则是“社会性”的。尽管如此，城市规划往往从相同于纪念性建筑那样的国家视角进行，即它整体被“自上而下”地计划、控制着。

亚历山大数学式地揭示了人工设计城市相对于自然成长城市所具有的致命缺陷。他指出：基于规划的城市都是“树状”结构，与自然成长的城市相比它过于简单，因而生活于这样的城市中的人们容易患上分裂症。

当然亚历山大并非反对规划本身。他只是批判了仅仅依靠理性来设计社会的傲慢而已。规划是必要的，因为没

有规划，城市会出于资本利益而肆意开发。规划是必要的，同时对其进行“批判”即认识到其局限也不可或缺。亚历山大和雅各布斯分别为我们指明了这一点。相对于亚历山大的抽象理论，雅各布斯作出了具体的实践。

雅各布斯是一名从正面反对 20 世纪 50 年代在纽约推进的城市再开发，并发起了市民运动的建筑记者。新的城市开发基于被称作“分区”（zoning）的思想，它以办公区为中心，把街道分为各种区域，在郊外设立住宅区。住宅区通过机车化（motorization）与中心相连。如今，世界所有城市都通过雅各布斯所批判的分区以及机车化进行开发以及再开发。她对此进行了批判。按照她的观点，新旧建筑的混合、住房与办公室的混合、各个阶层以及民族的混居才是城市的魅力以及活力所在。她并非反对城市规划本身，因为她的方案也是城市规划。但是她的规划不是为了国家以及资本，而是为了民众的人性生活。后来，雅各布斯在 60 年代末因反对越南战争移居加拿大。直至 90 高龄，她都作为批评家、实践家，在反对多伦多的城市开发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虽然如此，实际上在写完本书后，我几乎未对雅各布斯进行过任何思考。但是，当 2008 年我来到多伦多时，便深深地感受到了她的存在，尽管她已于数年前辞世。我在



多伦多大学演讲后，又到纽约大学水牛城分校作了演讲。多伦多市位于尼加拉瓜瀑布附近，而水牛城则是位于瀑布对面的美国城市。这两个城市都是作为安大略湖沿岸的工业城市而发展起来的，在70年代之前，它们大概几乎不分上下。但我注意到，如今在加拿大一侧的多伦多充满了活力，产业发展，而美国一侧的水牛城却衰退荒废了。

我认为其原因之一在于城市设计。多伦多城的中心是议会以及其他公共建筑。中心附近还有大学，再往外就是中国城，闹市区也相去不远。在闹市区遍布着地下街，人们不必来到地面，可以在地下过冬。除了地铁外，这里还行驶着无轨电车。也就是说，多伦多完全排斥了“分区”。而水牛城却完全实行了“分区”。比如，那里没有地铁，因为遭到了担心地铁建设会导致无车贫民涌入的富裕阶层、中产阶级的反对。大学则建在郊外，闹市区里还有喧嚣的贫民区。这是美国城市的典型。不仅如此，以分区进行城市开发的所有地方都出现了这种现象。

看一下昔日的好莱坞电影就能知道，30年代的洛杉矶还有无轨电车纵横行驶，但现在没有汽车就寸步难行。但在雅各布斯所活动过的纽约，现在地铁普及，并不需要汽车。当然这并非雅各布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市民们“社会性”活动的结果。但如果没有对城市开发具有明确理论

认识以及实践行动能力的雅各布斯，那么想必纽约就会变得像洛杉矶那样，多伦多也会变得像水牛城一般。

我深受感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位理论家或批评家，才会出现如此的差异。这给了我希望。我想把这样的希望传达给中国的读者。

柄谷行人

2009年1月27日于东京

## 英文版序言

1970年以来，人们就后结构主义的诸多问题展开了多方探讨。一言以蔽之，我们可称之为解构。我在本书中所要做的，可以说是从建构即建筑的角度来思考解构。事实上，与哲学以及文学批评不同的是，60年代以后的建筑师已经在从事与解构平行甚至超越解构的工作了。在此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概念首先产生自建筑界并非令人不可思议。不仅如此，结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建筑用语。也就是说，后结构主义中充斥着建筑的隐喻。

为了给哲学家下定义，柏拉图曾以建筑师作为隐喻。他说：“制造一词具有很宽泛的含义。毋庸赘言，无论何物，当它产生时，其原因完全都是因为制造。因此所有属于技术的制作都是制造，每一位从事制作的工作者都是制造者。”（《会饮篇》）这些工作者的首领就是建筑师。

对柏拉图而言，建筑意味着通过将一切“生成”看作

是“制造”从而与“生成”构成对抗的姿态，而他把这样的哲学家比作建筑师。但实际上柏拉图与雅典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并看不起那样的手艺活儿。建筑无非只是个隐喻罢了，因为实际的建筑有一半是属于“生成”的。可以说，柏拉图以降，是将知识建立在牢固基础上的意志。后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以及无数哲学家都把建筑师、城市规划者用作隐喻，而最新的例子则可说是结构主义者。

柏拉图不断地把几何学加以规范。但是几何学或者数学基本上是一种实践的技术，正是柏拉图使其成为坚固的“建筑”。柏拉图以及欧几里得在实践方面给数学带来的东西为数不多，相反，从排除了已在巴比伦王国发展起来的代数来看，其意义还是负面的。数学本身如同其现实那样，具有一半的“生成”性。自柏拉图以来人们之所以不断规范数学，是因为数学似乎最具建筑性质的可能。所谓哲学，就是“对建筑的意志”的别称。数学本身不具建筑性的可能，这已由1931年哥德尔提出的不完全性定理所证明。在此之前，作为隐喻的建筑一直统治着数学。进一步而言，作为隐喻的建筑还一直统治着建筑。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自20世纪70年代起，作为隐喻的文本替代建筑，占据了统治地位。比如巴特将文本与作

品加以区分。作品等同于建筑，那里存在着贯穿整体的意义，还有管理的主体（作者）。然而所谓文本则是语言的编织体，它由各种引用以及换喻式滑行组成，那里没有什么“作者”。当然这样的认知并非只有巴特或文学批评率先进行。实际上可以说各个领域都在阐述着同样的事情。比如后结构主义者所批判的列维-斯特劳斯就已经针对制造提出了“拼贴”（bricolage）概念。虽然建筑领域并未使用相同的词汇，但“作为隐喻的建筑”也日益被“作为隐喻的文本”所取代。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这一源自建筑领域的用语普及开来，最终压倒了“后结构主义”概念。此过程告诉人们，这一事态是如何与“建筑”相关的。

所谓作为隐喻的文本，基本上是一种认为“生成”优越于“制造”的主张，这就如同休谟之于康德，蒙田之于笛卡尔那样，是对肯定文本多样性的思想家的认可，而最终它还必定要回溯到对柏拉图的批判。尼采最早批判了柏拉图主义，即那种无法肯定“生成”的偶然性以及多样性的弱者所采取的“对建筑的意志”——柏拉图将其称为对真理的意志。但如果20世纪60年代后还将尼采与柏拉图对立起来，则是一种故意的无知了。如同迈克尔·塞尔所指出的那样，结构主义之后的思想基本上基于形式数学，与依然对数学进行浪漫主义式反击的尼采相比，它更是柏拉

图式的。

1970年代后期，文本作为隐喻逐渐取代建筑占据了支配地位。虽然我心有共鸣，但同时也产生了某种抵触感。本书的第一部分，是我在耶鲁大学时写就的。当时我个人就后结构主义问题作了些思考，觉得美国语境下的后结构主义似乎过于偏向文艺批评。比如，我认为德里达最初的成果——为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所作的注释就被视而不见，而德里达本人也过分迁就美国的文艺批评语境。虽然我本人是文艺批评家，却想对这种文学性倾向提出异议。因为实际上，解构只有在彻底结构化之后才成为可能，否则它就会止步于语言游戏的层面。

确实，柏拉图是抨击了诗人，但对他的反击在浪漫派中已经显现，而且还在尼采以及当今的文本派中延续着。这让解构很奇妙地具有了文学性。他们认为文本的意义具有不可判定性。但文学性文本的多样性本就不言而喻，称文学“不可判定”既轻而易举且廉价。不可判定性只有在被认为是严谨的、可判定的诸如数学等领域才具有意义。事实上，这已经被哥德尔所证明。

然而，将文学与数学对立，是浪漫主义者的偏见。数学并非像浪漫主义者所想的那样只是处理数与量，而是处理关系或者说只处理关系——数量是关系的形态之一。当

我们不把文学作为素材而是作为素材与素材的关系看待时，文学就是数学的对象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关系”是否与“物体”一样存在。柏拉图认为“关系”以不同于“物体”的方式“存在”，而那就是理念世界。我们无法简单地对其加以否定，因为即使否定了理念，物体与物体之间的关系区别依然留存着。

20世纪出现的形式主义者——比如数学领域的希尔伯特、语言学领域的索绪尔虽然提出了一种理念式的形式，却不认同那种认为形式“存在”于某处的观点。形式主义是一种使任意的形式先行，把对象以及意义作为其“解释”或“模型”的视点。可以说20世纪的知性问题本质上出自这种新奇的倒转。比如，认为只存在作为示差形式的能指，而所谓的意思则是这些示差形式所产生的所指。或者像列维-斯特劳斯在原始社会亲族关系的分析中所做的那样，不从事实出发去归纳性地思考模型，而是首先思考出形式的、数学的结构，并把经验性事实看作是解释这个结构的模型。这些例子基本上都是形式主义的思维。

形式主义出现在语言学、人类学、精神分析、思想史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然而这种展现出来的多样性却妨碍人们从本质上质疑形式主义所普遍具有的问题。如果我们质疑形式主义，那么我们必定会遇到柏拉图最初面对并作出

了回答的问题，即“形式”的地位问题。在形式主义内证明了其自身破绽的哥德尔本人就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其他领域的形式主义也不可能与哥德尔所指出的事实毫不相干。比如，可以说德里达式的解构就是在另一个领域做了哥德尔所做过的事。

然而柏拉图绝非随意提出了理念式事物的“存在”或者说知识的基础问题。实际上他希望通过实践做一个哲学家=王，却遭到了惨败。他在想象中实现了不可能之事。就好像保罗对耶稣那样，他把苏格拉底捧作理念的牺牲。这既显示了理念式事物“存在”的不可能性，同时也反复凸现了他必得实现的对建筑的意志。赋予西洋知识以特征的，正是这种对建筑的意志。

我无法简单地对其加以否定。相反我认为，正是这种彻底“建筑”化的姿态本身显示出了其无根据性，暴露了它的“生成”，只有通过彻底的建筑化、形式化，才能来到它的“外面”。仅仅依靠“生成”是无法对“建筑主义”（constructivism）构成批判的。相反，“生成性=自然形成性”的东西并不像它表面那样混沌不清，而是可以进行形式上的解析。我的这些想法都得益于考察了“自然都市”的城市规划理论家们。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倒转了之前的想法，认为从形式来看，“生成性=自然形成性事物”是一个自指的



形式体系。比如语言并不仅是差异体系而是自指的差异体系，此外货币经济则是通过将一个商品作为排他的一般等价物（货币）而形成的各个商品之自指的关系体系。

然而，实际上此时我不得不中断原来的计划。因为如果“生成”本身被形式化，那就不存在形式体系的“外部”了。我希望通过彻底的形式化从而走向形式的外部，却被以另一种方式封闭在了内部，而且在此已不允许随意提出“外部”的概念。按此前的形式化路线，已无法走到形式体系的外面，需要更具决定性的“转向”。我中途放弃了《作为隐喻的建筑》（1981）以及作为其续篇的《语言、数、货币》（1982）。在这找不到出口的低迷时期，给了我最大刺激的是爱德华·赛义德一篇题为“世俗批评”（Secular Criticism）的文章。

但是，不可避免地某种情况发生了。美国70年代后期的文学理论非但不是超越专业划分的大胆的介入运动，相反还后退到“文本性”的迷宫中去了。……美国乃至欧洲的文学理论如今都明确接受了不介入的原则，可以说其独特的所有方式（借用阿尔都塞的公式的话）排除了被世俗性、情境性或者社会性所“污染”的东西。“文本性”成了文艺理论中具有某种神秘性质的被“消毒”